

嶺南學報 Lingnan Journal (1929-1952)

Volume 8
Issue 2 第八卷第二期

Article 1

January 1948

同情的批評

Ching Chih LI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commons.ln.edu.hk/ljcs_1929



Recommended Citation

李鏡池(1948)。同情的批評。《嶺南學報》，8(2)，1-28。檢自：http://commons.ln.edu.hk/ljcs_1929/vol8/iss2/1

This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Scholarly Publications of Ling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at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嶺南學報 Lingnan Journal (1929-1952)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同 情 的 批 評

李 鏡 池

一、文學批評的主觀與客觀

文學批評的派別，有偏重於主觀的，如印象的批評是；有偏重於客觀的，如歷史的批評是。印象的批評，對於一種作品，不管它怎樣產生，也不問它的價值，只憑自己的愛好，說自己的印象。“讓自己的靈魂在傑作中遊行，”然後把自己所得的印象，作品對於他所發生的效力，用文字紀錄下來，給別的讀者作參攷。他的態度，只是把個人讀一種作品得到的反應作一種報告。他對於讀者，不負批評的責任，不勉強你去聽他的話；讀者跟他一樣，可以把每個人所得的印象，反應，報告出來。他認為對於一種作品的反應，遠比作者結構時的歷程來得重要。這種反應，純是個人的，印象的，主觀的。他用不着標準，他自己就是標準，他個人的感情的欣悅與愛好，就是標準。他不必去尋究作者，不必理會作者所以產生那作品的歷史的，社會的背景，他把他的印象報告出來，只是說，他有那樣的反應，也許你也有那樣的反應吧；但你可以不必聽他的。總之，這是主觀的批評。

至於歷史的批評，是要把作者的生平，時代的背景，社會環境的關係，一一尋究出來。孟子說：

“以友天下之士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萬章下）

知人，論世，是歷史的批評。這種歷史的研究，可以把作品中的意義，和作品的重要性，給讀者清楚的說明，對於讀者有很大的幫助；雖則批評家或者對於作品不下批判，但他這樣一解釋，讀者也就能對於作品得到評價了。文學作品是一種有機的組織，植根於人類社會，它和人類歷史，有很大的關連。文學是反映時代的。我們不能離開現實來創作文學。同樣，我們要深切的了解文學作品；也必定要從它的歷史背

景去尋究。對於歷史了解愈多，對於文學的欣賞也愈深。美國蒲克女士說：

凡與他所讀的那件作品一切有關的智識，無論是歷史的，文字的，心理的，文學的，無不一一顧及，以期所讀的東西可以格外了解，讀書的意義也格外深宏，而使作者所欲傳達給讀者的心理。(G. Buck: Social Criticism of Literature.
傅東華譯)

這種歷史的批評是客觀的。這不是以個人的好惡為標準；是以歷史的事實為根據。這不是以一時的感情為衡量，是以客觀的態度來辨析。這不是不負責任的報告；是要尋求永恆的真理。

批評不只這兩種；這兩種是代表距離較遠的兩派。上舉的蒲克女士所提倡的社會的文學批評，是調和主觀和客觀的批評。她論批評家的職務說：

- 批評家的讀書，必須是一種不絕進步的程序。這樣的讀書，對於某一書或某一作者，必定繼續的要品評他的價值。然而這種價值的品評，只能有暫時的效力和比較的真確。……無論何人，要問他有沒有賞鑑文學的資格，須看他對於一件作品是否真正有一種意見，而不必看他的意見為如何。……批評的價值，並不在論斷的本身，而在層層剝進的去求論斷的全部程序。一換句話說，便是在和文學所以為文學的那件東西，親密的不絕的發生接觸。……從社會的觀察點看起來，一本書，只要能使一個人比他尋常所見的格外明白些，比他尋常所想的格外正確些，比他尋常所感的格外深到些，這便可證明牠自己有存在的權利，且有受人讀的權利。

批評家的第一種職務，便是要做一個好讀者，更由此而對所讀的書的價值求得一種結論。批評家既得了這種結論之後，即須認牠為一種試驗的，個人的結論。……他的職務，是幫助別人讀書。……將自己對於一本書的意見，發表出來，因以激起別人真正去讀書，這便是近世批評家的目的。……他只須將自己對於一種文學的豐富的圓滿的經驗，用一種具體的批評論文的形式貢獻給讀者。

她在‘比較宏大的批評說’一章裡說，批評是經過三個階段的：一是‘批評的閱讀’(Critical reading)，二是‘批評的理論’(Critical theory)，三是‘批評的裁判’

(Critical judgment). 她說：“文學祇是一種繼續的大活動，因讀者而進行，也爲讀者所進行；惟至讀者來參與這種活動，然後這種活動乃達到牠的終極的一步。”又說：“文學直接產生於作者的意識中，最初則種源於作者所處時代的意識中，但必至傳達到讀者的意識中，有以啓發他，或有以促進他的活動，這才能算完備。”

文學既然是作者與讀者的繼續的大活動，是有機體的活動，所以讀書一事，“是要親身去參與作者所欲傳達給我們的經驗，必須讀者能以文字的刺戟，按作者的思路思想，能見作者所見過的東西，能聽作者所聽見過的東西，能感到作者所感受過的東西，然後才真能叫做讀書。”

怎樣才能按作者的思路去思想呢？那就是設身處地的讀法。

“他須將作者所發的政治的社會的和實業的環境，以及作者個人爲此環境所造成的生活，逐一都設想起來，彷彿身處其境，身爲作者一般。否則對於作者由他的特殊情境所產生及所左右的思想，決不能完全領悟。

“更進一步，他又須曉得作者所用的工具是什麼，他採用的是何種體裁，有怎樣的缺點和怎樣的可能性，當他運用這種工具的時候，牠已經發展到如何程度。——否則他決不能完全了解作者以這種體裁表現的人生觀。”

這種設身處地的讀書法，我叫它做同情的讀書法。由這樣讀書法而得到的批評，我叫它做“同情的批判。”

近人陳寅恪先生評論馮友蘭先生著的中國哲學史說，“凡著中國古代哲學史者，其對於古人之學說，應具瞭解之同情，方可下筆。”“瞭解之同情，”是研究古代哲學的方法；我可以說，這也是研究古今文學的方法，用這個方法，然後可以了解，然後可以欣賞。所以陳先生的話，可以借來做我們講同情的批判的文學批評的說明。

蓋古人著書立說，皆有所爲而發；故其所處之環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瞭，則其學說不易評論。而古代哲學家去今數千年，其時代之真相，極難推知。吾人今日可依據之材料，僅爲當時所遺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殘餘斷片，以窺測其全部結構，必須備藝術家欣賞古代繪畫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後古人立說之用意與對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謂真了解者，必神遊冥想，與立說之古人，處於同

一境界，而對於其特論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詣，表一種之同情，始能批評其學說之是非得失，而無隔閡膚廓之論。（馮著中國哲學史下冊審查報告一）

孟子對於頌詩讀書，雖主張知人論世，同時，他又主張“以意逆志”的。知人論世，是客觀的研究；以意逆志，是主觀的體會。萬章篇載：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旣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爲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子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

按照情理，探求詩人的意旨情志，這是讀古人書的一種重要方法。用這方法來讀書，則可以體會入微，深得作者的本意。不過孟子這種‘以意逆志’法，其好處在能‘逆志’，近於我們的所謂同情的了解；其流弊，在‘以意’逆志，往往主觀太重，穿鑿附會，只憑自己的意去亂斷詩人的志。漢儒解詩，就犯了這個毛病，往往強古人以從我。孟子自己，也是犯了這個毛病。例如公孫丑對於魏風伐檀篇‘不素餐兮’的解釋，以為是‘君子不耕而食’，本來是很對的，但孟子却偏偏說遠了，說：“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盡心上）這是孟子的思想，而不是詩人的本旨。就詩論詩，這變爲胡說，而不是逆志了。

文學的創作，不特反映時代，而且也批評時代。作者的用意，往往針對時代，有爲而發。其態度是“爲人生而藝術。”（Art for life's Sake. Arthur Ransome語）作者把他的強烈的人生意識，他的思想感情傳達給讀者，讀者從文學的形式，去了解接受作者的意識，思想，感情，而提高自己的思想感情，和人生意識。所以作者與讀者，成爲有機體的連繫。這就是文學的功用。

古人讀文學，最着重它的功用。作品使讀者起反應，而後文學的使命方完成。着重文學的功用，論語載孔子勸人讀詩的話，可爲代表。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季氏）

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陽貨）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陽貨）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
（子路）

讀詩可增加知識，涵養德性；讀詩可以做外交官，應對有美妙的辭令；讀詩，可以在政治上借來美刺諷頌，在社會上使人團結一致。文學的功用真大。這還不夠，孔子的讀詩，還要“引譬連類”，感發引申。例如：

子貢曰：“貧而無譖，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學而）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
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八佾）

起者，興也，當即‘詩可以興’之意。因容飾而講到繪事，由繪事而推究到‘禮後’，這是具體而講到抽象；由普通事物推展到社會倫理。子貢因討論道德修養之進展，聯想到詩句具體之描寫亦可以有相通之理。這是一種“觸類旁通”的悟境。我們讀書，也需要聯想與悟性。有聯想與悟性，然後文學的含義非常豐富。上面說過，文學作品是一種有機體，是作者與讀者的繼續的大活動，也就是由作者傳達，而讀者完成之。

以上所說，我們要明白兩件事：

一，文學是一種有機體，由作者創作，由讀者完成。讀者可以分享作者的快樂，批評也就無異於創作。他對於一種作品，須認真的閱讀，同情的批評，設身處地的體會。

二，批評家須是一個好的讀者，盡可能的了解作品與作者，他的態度是主觀的同時也是客觀的。過於主觀，便只有自己而無作品。過於客觀，會只見作品的外形而不深知作者的真精神。必與作者冥會默契而感通，方能認識作品的真價值。這當然

同情的批評

是很難做到的事，但我們要做一個好讀者，好批評家，却不能不向這方面努力。

二、“文人相輕”的分析

魏文帝典論論文：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小之。與弟超書曰：
‘武仲以能屬文爲蘭台令史，下筆不能自休。’

曹植與楊德祖書：

以孔璋之才，不關於辭賦，而多自謂能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反爲狗也。……世人之著述，不能無病。僕常好入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常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過若人，辭不爲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嘗歎此達言，以爲美談。……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其淑媛；有龍泉之利，乃可以議其斷割。劉季緒才不能逮於作者，而好詆訶文章，掎摭利病。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皆五霸於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劉生之辯，未若田氏；今之仲連，求之不難。可無息乎！

劉勰文心雕龍知音篇：

知音其難哉！音實難知，知實難逢；逢其知音，千載其一乎！夫古來知音，多賤同而思古，所謂日進前而不御，遙聞聲而相思也。……至於班固傅毅，文在伯仲，而固嗤毅云：“下筆不能自休。”及陳思論才，亦深排孔璋；敬禮請潤色，歎以爲美談；季緒好詆訶，方之於田巴，意亦見矣。故魏文稱文人相輕，非虛談也。至如君卿唇舌，而謬欲論文，乃稱史遷著書，諮東方朔，於是桓譚之徒，相顧嗤笑（註一）彼實博徒，輕言負誚，況乎文士，可妄談哉？

（註一）史記游俠傳：“樓護字君卿，與谷永俱爲五侯上客，長安號曰：‘谷子雲筆札，樓君卿唇舌。’言其可信用也。”

史記太史公自序索隱：“桓譚云：‘遷所著書成，以示東方朔，朔皆署曰太史公。’按劉勰之意，謂桓譚笑君卿論文之謬，索隱所記，似非一事。又劉勰所言，亦與游俠傳異。

按文心誄碑篇：

誄述祖宗，蓋詩人之則也。至於序述哀情，則觸類而長。傅毅之誄北海，云‘白日幽光，霧霧（古文苑作淮雨）杳冥，’始序致感，遂爲後式。景而效者，彌取於工矣。

又頌讚篇：

若夫子雲之表充國，孟堅之序戴侯，武仲之美顯宗，史岑之述熹后，或擬清廟，或範嗣那，雖淺深不同，詳略各異，其褒德顯容，典章一也。

又雜文篇：

自七發以下，作者繼踵。……及傅毅七激，會清要之工；崔駰七依，入博雅之巧。……

又才略篇：

傅毅崔駰，光采比肩；瓊實踵武，能世厥風者矣。

劉勰對於傅毅，推崇備致。其中稍有譏評，則與班固同列。頌讚篇：

至於班傅之北征西巡，變爲序引，豈不褒過，而謬體哉？（註二）

傅毅生平及著作，據後漢書文苑傳（卷八十上）所載：

傅毅字武仲，扶風茂陵人也。少博學。永平中（明帝號，西元58—59）於平陵習章句，因作述志詩。……毅以顯宗求賢不篤，士多隱處，故作七激以爲諷。建初中（章帝號，西元76—83）肅宗博召文學之士，以毅爲蘭台令史，拜郎中，與班固賈逵共典校書。毅追美孝明皇帝功德最盛，而廟頌未立，迺依清廟作顯宗頌十篇奏之。由是文雅顯於朝廷。……永元元年（和帝號，西元89年）車騎將軍竇憲復請毅爲主記室，崔駰爲主薄。及憲遷大將軍，復以毅爲司馬，班固爲中護軍。憲府文章之盛，冠於當世。毅早卒，著詩賦頌祝文七激連珠凡二十八

（註二）古文苑卷十二存班固車騎將軍北征頌，嚴可均全後漢文輯傅毅西征頌一條。

篇。(註三)

毅所作廸志詩，用四言體，自敘志趣，文極質樸。明帝誄，北海王誄，亦用四言，擬詩經體，頗具情致。如北海王誄：

于是境內，市不交易，塗無征旅，農不脩畝，豈無女工，咸相慘怛，若喪厥親，俯哭后土，仰憇皇旻。……

所以劉勰謂“遂爲後式，影而效者，彌取於工矣。”七激“會清要之工，”舞賦假問答之辭，雖注重描寫，實辭賦尋常的體製，不見得有甚麼“下筆不能自休”的毛病。所謂‘下筆不能自休’，或者像魏文譏孔璋‘微爲繁富’或譏王粲‘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與吳質書)或者像文心雕龍所謂‘辭或繁襯’“若術不素定，而委心逐辭，異端叢至，駢贅必多”“辭敷而言重，則蕪穢而非贍；”“士衡才優，而綴辭尤繁。”或“辭如川流，溢則汎濫。”(鎔裁篇)即普通所謂‘冗繁’‘沒剪裁’吧。但我們讀傅毅所作，都沒有這種毛病。

據我看，班固之所以譏評傅毅，除了曹丕所說，‘文人相輕’的緣故外，一則由於他好問難不苟同的脾氣，一則由於他的史文尚雅潔的作風。

漢書叙傳，“固弱冠而孤，作幽通之賦，以致命遂志。”“永平中爲郎，典校祕書，專篤志於博學，以著述爲業，或譏以無功，又感東方朔楊雄，自諭以不遭；蘇張范蔡之時，曾不折之以正道。明君子之所守，故聊復應焉。”他這兩篇自敘志趣的文章，固已自命不凡，不同流俗。後漢書固本傳：

及肅宗雅好文章，固愈得幸，數入讀書禁中，或連日繼夜，每行巡狩，輒獻上賦頌。朝廷有大議，使問難公卿辯論於前，賞賜恩寵甚渥。……後遷玄武司馬。天

(註三)傳毅明帝誄見藝文類聚十二，北海王誄見古文苑卷二十，(藝文類聚四五誤作傳龍。)

)七激見藝文類聚五十七，舞賦見文選卷十七，藝文類聚四十三，初學記十五，(古文苑二有宋玉舞賦，實傳毅舞賦的節本。)古文苑十三載毅之車左銘，車右銘，車後銘，廿一載琴賦，(藝文類聚四四，作雅琴賦)，東巡頌。嚴可均全後漢文四十三傳毅之作，尚有洛都賦，反都賦。(一條)扇賦(一條)與荆文姜書(一條)顯宗頌(二條)寶將軍北征頌，扇銘(一條)

子會諸儒講論五經，作白虎通德論，令固撰集其事。

章帝大會太常博士議郎郎官及諸生諸儒于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是學術上一件大事。當時講論辯難，考詳同異，學術的空氣很濃厚。參加白虎觀論學的有楊終、魏應、淳于恭、李育、賈逵、張酺、魯恭、桓郁、丁鴻、召騫、樓望、劉羨等。例如丁鴻，後漢書三十七鴻傳：

鴻年十三，從桓榮受歐陽尚書，三年而明章句，善論難，爲都講。遂篤志精銳，布衣荷擔，不遠千里。……永平十年，詔徵鴻，至卽召見，說文侯之命篇，賜御衣及綬，稟食公車，與博士同禮。……肅宗詔鴻與廣平王羨及諸儒樓望成封桓郁賈逵等論定五經同異於北宮白虎觀。使五官中郎將魏應主承制問難，侍中淳于恭奏上，帝親稱制臨決。鴻以才高，論難最明，諸儒稱之。帝數嗟美焉。時人歎曰：‘殿中無雙丁孝公。’數受賞賜，擢徙校書。遂成封爲少府，門下由是益盛，遠方至者數千人。

在這樣講論學術，批評問難的風氣下，自然養成一種批判精神。漢代最富於批判精神的哲學家王充，是班固的父親班彪的學生。王充傳註引謝承後漢書載：

固年十三，王充見之，拊其背謂彪曰：‘此兒必記漢事。’

班固的批判精神，或者從小就受這位師兄的影響了。後來白虎觀論議，朝廷有大議，奉帝命問難公卿辯論於前，這當然養成一種好批評人的脾氣。這種精神對於他寫漢書很有關係，因為歷史家是需要有客觀的批判精神的。固本傳記載他兩件事，一是評文，二是論事。

固又作典引篇，述叙漢德，以爲相如封禡，靡而不典；揚雄美新，典而不實。蓋自謂得其致焉。

時北單于遣使貢獻，求欲和親，詔問群僚，議者或以爲匈奴變詐之國，無內向之心，徒以畏漢威靈，逼憚南虜，故希望報命，以安其離叛。今若遣使，恐失南虜親附之歡，而成北狄猜詐之計，不可！固議曰：“……未有一世闕而不修者也。……宜依故事，復遣使者。……絕之未知其利；通之不聞其害。”……

不論評文論事，他都有他的獨到的見解。范曄論他著史的成功說：

若固之序事，不激詭，不抑抗，贍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亹亹而不厭，信哉其能成名也。

至于班氏漢書，於武帝以前事，多襲用史記之文。然其文字往往簡淨無華，刪去浮詞虛字。史記有如長江大河，浩瀚無涯；漢書則如重山疊嶺，雄偉高峻。事實固多相同，文辭迥然有別。若將史漢比較，很容易看出來，他們的作風是不同的。班固譏評傅毅，大概傅毅的作風近史遷，如波濤洶湧，萬馬奔騰。這是班固所不喜歡的。

文章體裁，各有風習。我們不能以自己所好的，反對所不好的。文心雕龍體性篇分析文章有八體：

一曰典雅，二曰遠奧，三曰精約，四曰顯附，五曰繁縟，六曰壯麗，七曰新奇，八曰輕靡。典雅者，鎔裁經誥，方軌儒門者也；遠奧者，馥采典文，經理元宗者也；精約者，覈字省句，剖析毫釐者也；顯附者，辭直義暢，切理厭心者也；繁縟者，博喻釀采，煥焯枝派者也；壯麗者，高論宏裁，卓犖異采者也；新奇者，擅古競今，危側趣詭者也；輕靡者，浮文弱植，縹緲附俗者也。故雅與奇反，奧與顯殊，繁與約舛，壯與輕乖，文辭根葉，宛圈其中矣。

一個作家所以形成他的那種作風，就因為學習，才氣，性染，各異。

才有庸儻，氣有剛柔，學有淺深，習有雅鄭，並情性所鍛，陶染所凝；是以筆區雲譎，文苑波詭者矣。……

若夫八體屢遷，功以學成。才力居中，肇自血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吐納英華，莫非情性。

是以賈生俊發，故文潔而體清；長卿傲誕，故理侈而辭溢；子雲沈寂，故志隱而味深；子政簡易，故趣昭而事博；孟堅雅懿，故裁密而思靡；平子淹通，故慮周而藻密；仲宣躁銳，故顯出而才果；公幹氣褊，故言壯而情駭；嗣宗傲儻，故響逸而調遠；叔夜儔俠，故興高而采烈；安仁輕敏，故鋒發而韻流；士衡矜重，故情繁而辭隱；觸類以推，表裡必符。豈非自然之恒資，才氣之大畧哉。

近人陳望道修辭學發凡，從體性上分文體爲四組八種：

1. 由內容和形式的比例，分爲簡約，繁豐；

2. 由氣象的剛強與柔和，分爲剛健，柔婉；
3. 由於話裏辭藻的多少，分爲平淡，絢爛；
4. 由於檢點工夫的多少，分爲謹嚴，疏放。

班固的文章，是彥和所謂典雅派，所以說：“孟堅雅懿，故裁密而思靡。”所作漢書檢點的工夫深，即陳氏所謂謹嚴派。至於傅毅，或者像賈生的俊發，‘文潔而體清’；或者像安仁之輕敏，‘鋒發而韻流。’所以彥和說：‘傅毅七激，會清要之工；’又說：‘傅毅崔駰，光采比肩。’他是屬於繁富或疏放一派，與班固異趣。孟堅對他不滿，就是因為氣味不投，趨尚各異。班固囿於自己的風習，對武仲不能作同情的了解，這是文人相輕的毛病。

(附)關於傅毅作風，我們為明瞭起見，這裡舉北征頌一篇，以見一斑。雖則彥和說班傅二家之作，變頌贊為序引，有謬體之譏。但傅毅北征頌，很可以代表他的作風，故附錄于此。文獻藝文類聚五十九，茲據全後漢文卷四十三。

贊將軍北征頌

逮漢祖之龍興，荷天符而用師；曜神武于幽冀，遇白登之重關。何猶鸞之桀虧，自弛放而不羈。袁昏戾之習性，阻廣漢之荒垂。命蠻侯之征討，蹕衛霍之遺風。奉聖皇之明策，奮無前之嚴鋒。採伊吾之城壁，跨天山而遙降。曝名烈于禹跡，奉旗鼓而來旋。聖上嘉而褒寵，典禁旅之戎兵。內雍容以詢謨，外折衝于無形。惟倜儻以弘遠，委精慮於朝廷。

三、 摘謬與同情

我們把班固對於傅毅的批評分析一番，覺得一個人的批評，往往由於他的素養性習的關係，不免流於偏見，以自己的尺度，來衡量別人，結果便犯了文人相輕的毛病。現在再舉兩個也是同時代的人，因為文學見解不同，互相抨擊。其中一個頗享盛名，而別一個專跟他為難，把他的文章指摘得體無完膚。到被攻擊的死了之後，他才悔悟，覺得自己做得太過。這也是沒有同情的批評的好例，我們再舉了來討論一下。這兩個人就是清初的汪琬與葉燮，汪琬是清初的古文大家，葉燮是一位對於詩文很有創見的詩人。

李元度國朝先正事畧卷三十七 汪堯峯先生事畧:

先生名琬，字若文，號鈍菴。江蘇長洲人。學者稱堯峯先生。

少孤，讀書五行俱下。順治十二年進士，觀政通政司，未幾假歸。肆力古文辭。

嘗慨然念前明隆萬以後古文道喪，乃由南宋以上溯韓歐，卓然思起百數十年文運之衰。尋補戶部主事，……改刑部員外郎。……公退，無時不以古文自娛，嘗與龔端毅鼎華，李文定天馥，王文簡士禎，陳文貞廷敬，宋尚書犖，劉戶部體仁，董侍御文驥等，以詩文相切劘。陳公侍直禁廷，聖祖問今能爲古文者其誰？輒舉先生以對。先生因文見道，務爲經世有用之學。故歷官皆有名蹟可紀。……病免歸，結廬堯峯，居九年，益閉戶著書。……

先生以道德文章爲己任，雖與一時賢士遊，而流俗往往不悅其所爲，深中者尤忌畏之。……

所居堯峯，擅山水之勝，蕭然野服，手一編矻矻窮年，曰：“吾老猶冀有所得也。”嘗語學者曰：“學問不可無師承，議論不可無根據，出處不可無本末。”

其文根抵六經，出入廬陵震川間；於易書詩春秋三禮喪服，咸有發明。

性卞急，不輕許可。嘗與宋荔裳爭辯，歸而恚曰！“吾奈何與彼同名！”然坦中無城府。人有一言之善，不難俛首至地。

生平淡於榮利，難進易退。自登仕籍，前後閒居二十餘年，泊然自樂也。

清史列傳卷七十:

琬少孤，自奮於學，銳意爲古文辭。古文自明代膚濫於七子，纖佻於三袁，至啓禎而敝極。國初風氣還醇，一時學者始復唐宋以來之矩矱。琬學術既深，軌轍復正。其言大抵原本於六經，灑疏漸暢，頗近南宋諸家，廬陵南豐固未易言接跡；唐歸無愧色也。其叙事尤善。一時公卿誌銘表傳，必以琬爲重。詩則兼范成大、陸游、元好問之勝。少年所擬六朝三唐諸體，則夷然棄之。嘗歎文章家好名寡實，鮮自重特立之士，故褒譏不少寬假；又性卞急，不能容人。過意所不可，輒面批折人。雖詩文小得失，不肯稍徇。以是人多嫉之。士友相傳，“汪鈍翁喜嫚罵人！”……

琬前自輯詩文爲類稿六十二卷，先刊板置之堯峯山閣。歸田後十年，爲續

稿三十卷。又取明史列傳稿，汪氏族譜，及其父行略，爲別集二十六卷刻之。後復取其愾意者爲堯峯詩文鈔，屬門人林佶繕之，惠周惕序之，世間多有其本，而類稿遂不顯。

汪琬性既卞急，不能容人，喜歡罵人，引起反感，自然也被人罵。他對於經學研究，似乎以禮學爲最長，著古今五服考異八卷，堯峯文鈔中有經解六卷，有兩卷是講禮的。但閻若璩潛邱劄記對於他答人論祥禪書，評爲‘譏尤不可勝言。’江藩漢學師承記于閻傳記若璩改訂顧炎武日知錄數則（亦載潛邱劄記），炎武心折；但他糾正汪琬之謬，琬却捨學術不談，攻擊閻氏的行爲。

留京師，與長洲汪編修琬反覆論難。琬著五服考異成，若璩糾其謬。琬雖改正，然譏前轍，謂人曰：‘百詩有親在，而喋喋言喪禮乎！’若璩聞之，曰：‘王伯厚嘗云：夏侯勝善說禮服，謂禮之喪服也；蕭何之以禮服授皇太子：則漢世不以喪服爲諱也。唐之奸臣，以凶事非臣子所宜言，去國恤一篇，識者非之。講禮之家，豈可拾其餘唾哉！’……

天性多否少可，詞科五十人中，獨許吳志伊之博覽，徐勝力之強記而已。如李天生，謂其杜撰故事；汪鈍翁，謂其私造典禮。

沈德潛清詩別裁卷三稱汪琬：“生平穿穴經史，議論俱有根柢，雖被其齶齒者，終稱許焉。”汪閣兩個性急人，對人少許可的，碰在一起，便對罵起來。但汪琬在學術上不如閻若璩之精博。在文學上，他雖享有盛名，與侯方域魏禧齊名，爲清初古文三大家；但他的古文，只知“奉古人法度，猶賢有司奉朝廷律令，循循縮縮守之而不敢過。”（魏禧答計甫草書對於汪的評論）所以被葉燮指摘，謂：“汪君摹倣古人之文，無異小兒學字，隔紙畫印。尋一話頭發端，起承轉合，自以爲得古人之法。”（汪文摘謬）（註四）

先正事畧卷三十八葉橫山先生事畧：

其議論不蹈襲前人，卓然自吾立，方爲立言。論詩曰生，曰新，曰深。凡一切庸熟陳舊淺語，須一掃空之，所作詩，意必鉤玄，語必獨造，寧不諧俗，不肯隨俗。

（註四）汪文摘謬一卷，上海醫學書局排印本。

於同時諸家外，能拔幟自成一隊。……

汪編修琬居堯峯，說經硜硜與先生持論鑿枘，門下士亦互相詆謔。汪琰，先生曰：“吾向不滿汪氏文，亦謂其名太高，意氣太盛，故麻列其失以規之，非謂其繆鑿於聖人也。且汪琰，誰譏彈吾文者。”乃取向所摘汪文短處悉燔之。

清史列傳七十：

燮幼穎悟，年四歲，紹袁授以楚辭，卽能成誦。及長，工文，善吟咏。……燮言詩以杜甫韓愈爲宗。陳見俗障掃而空之。其論文與長洲汪琬不合，往復詆謔。及琬歿，慨然曰：“吾失一諍友，今誰復彈吾文者！”取向所短汪者悉焚之。

寓吳時，以吳中稱詩多獵范陸之皮毛，而遺其實，遂著原詩內外篇，力破其非。吳人士始而訾譽，久乃更從其說。

新城王土禎稱燮詩古文鎔鑄古昔，能自成一家言。

所著有己畦集十卷，詩集十卷，原詩四卷，殘稿一卷。

葉燮所以詆謔汪琬者，據他說，是因爲汪琬名高氣盛，想列舉他的錯誤以規勸之。這也近于文人相輕。此外還有幾種原因：

一，學習不同：汪詩兼范成大陸游元好問之勝，也就是吳中當時詩壇的風氣，學南宋的詩，（註五）而葉燮則斥爲‘多獵范陸之皮毛而遺其實’的。葉是取法于杜甫韓愈的。取徑不同，風習自異。

二，汪自號‘鈍翁’，或者他是個鈍根人，鈍根人注意功力，作風便偏于講規矩，守法度；葉燮是個聰明人，聰明人要創新，不受屬綽。

三，他們的文學見解，完全兩樣：汪琬論文，不主新奇。‘文以載道’一語，是他的中思想。（註六）他以為人文與天文地文是一樣的，天行有常，不爲新奇；新奇則爲

（註五）文鈔三十二，與梁曰網論類稿書：“至謂原流派別出於南渡諸家，苟非知已，不能深悉其本末洞然如此也。”

（註六）唐代古文家主張文以載道，宋代道學家主張文以載道，宋以後古文家都受宋理學的影响，也都襲用舊說。汪氏論文，在形式上主張樸倣，主張守法；在思想上，是主張義理，主張文乃載道之器。

妖變。故文章內容，一本之聖人之大道；文章形式，以六經三史唐宋大家爲法度。葉燮論文，則探究文學之史的演變，不主張模倣，反對復古。他分析詩文的本質爲‘理事情’三種東西，是不變的。至於詩文的作法則無定的，不能不跟歷史的演變而演變的，所以無須模倣。原詩一說：

自開闢以來，天地之大，古今之變，萬象之躋，日星河嶽，賦物象形，兵刑禮樂，飲食男女，於以發爲文章，形爲詩賦，其道萬千，余得以三語蔽之，曰理，曰事，曰情，不出乎此而已。然則詩文一道，豈有定法哉？先揆乎其理，揆之於理而不謬則理得；次徵諸事，徵之於事而不悖則事得；終絜諸情，絜之於情而可通則情得；三者得而不可易，則自然之法立。故法者：當乎理，確乎事，酌乎情，爲三者之平準而無所自爲法也。

他講詩文，探求文章的本質；他講文學寫作，又探究文學家的本領，文學家的本領有才膽識力四種，原詩一又說：

大凡人無才則心思不出，無膽則筆墨畏縮，無識則不能取舍，無力則不能自成一家；而且謂古人可罔，世人可欺，稱格稱律，推求字句，動以法度緊嚴，扳駁銖兩；內既無具，援一古人爲門戶，藉以壓倒衆口；究之何嘗見古人之真面目，而辨其詩之源流本末正變盛衰之相因哉。

才膽識力四者之中，他尤其着重‘識’。原詩二說：

四者無緩急而要在先之以識；使無識則三者俱無所託。無識而有膽，則爲妄，爲魯莽，爲無知，其言背理叛道蔑如也。無識而有才，雖議論縱橫，思致揮霍，而是非滑亂，黑白顛倒，才反爲累矣。無識而有力，則堅僻妄誕之辭，足以誤人而惑世，爲害甚烈。…惟有識則能知所從，知所奮，知所決，而後才與膽力，皆確然有以自信，舉世非之，舉世譽之，而不爲其所搖，安有隨人之是非以爲是非者哉。

總之，葉燮是一個有識見有膽量有理論系統的文學批評家，也是一個有才氣有力量的文學創作家。所以他對於汪琬文章的指摘，有許多地方，的確是很中肯的。例如他批評汪氏的送姚六康之任石埭序說：

據此文大旨，以姚之奉釋立論，則布局須以儒爲主，釋爲賓；卽欲引老子入篇

中，又當以釋爲主，老爲賓。從老入釋，則當軒釋而輕老；從釋以較儒，方得結釋以歸儒：則賓主層層，無不秩然矣。今篇首雙提老釋，既無賓主；而叙老在釋先，又添入‘與’字，似老爲主而釋爲賓；及觀下文，一段老，一段釋，一段說釋不異老，一段說釋可通儒，而總曰‘比肩老子不難，’總三教而結穴於老子，其側重偏提，意在何處着落？頭緒紛然，結束何屬？

此文專爲姚君奉釋立論，於老子實風馬牛，無路可攏入；即欲攏入，以二氏雙提，已是顧賓失主。今文前半專歸重老子，以致偏重難返，故自入題後，只好料理姚子奉釋正面，不得不將老子擋起，於是老子來有踪而去無跡矣。方知前半嘵嘵說老子，何異說夢！忽然自覺無謂，只得於篇末雙提釋老一句救之，可謂苦矣。

此文實以姚君通乎釋，而釋氏之理通於儒，儒釋兩兩相較，頭緒始清。老子原無坐位處。今文純以老子作波瀾，更推他作主，釋與儒俱退而避之，其大謬處，總在‘比肩老子不難’一句，後遂不可收拾，亦竟不復收拾矣。文無結構，意無主宰，論無成說，信手拈來，可謂頭頭不是道矣。

這一篇的批評，可謂最中汪琬的毛病。汪氏古文，本來是講究結構的，送姚六康序，條理也還清楚。先論老釋之道可通于儒，次叙姚子乃儒而通于釋者。汪氏的毛病，乃在他的識見不夠深刻，理論不夠完滿，對佛教原無研究，本意亦未必贊成佛教，不過因爲這位去做官的朋友是信佛教的，就從這位朋友身上做起文章來，因題命意，緣事起論，結果就變爲葉氏所譏‘意無主宰，論無成說’，而文亦無結構了。這篇文章，的確作得不好，所以堯峯文鈔把這一篇刪去了。

然而葉燮之評汪文，也有未必確當的，汪氏固然不會悅服，即我們現在也覺得他的批評，有點近於苛刻。其所以近於苛刻的緣故，因爲評者未必了解作者用意，葉燮不明白汪琬的心情。例如送魏光祿歸蔚州序一文，結構技巧上是相當嚴密的。先引鄒志完一段故事爲導論，而自比于王回，籠罩全文，前後照應，這是汪文的長處。第二段敘魏環極乞歸終養，因而追敘魏氏居官之功績與見嫉而退的緣故。‘由是言之’以下爲第三段，表示自己的意見，希望他待時再出。末了一小段結語，說作序之

，與篇首故事相呼應。中間兩段，一敘一議，各分三節，文極整齊。在葉燮的摘謬裡，除去關於用字遣詞有可議的地方，我們不談，單提與事理有關的兩處來討論一下。

(一)汪文：“今光祿丞魏環極先生，固士大夫所稱有道者也；一旦上書於朝，乞歸終養，若以魏當世之嗜仕不止者。”

葉評：“摘曰：‘乞歸終養’句下，緊接‘魏當世’句，翻似乞終養是旁意，魏當世是正意；然則魏先生之歸也，徒出於矯世激俗者之所為，與陳情乞恩之旨，判然爲二。奈何篇首提忠孝爲綱領，入題翻先提題外之意？夾襍錯亂！‘魏當世’句，後無一句照應，作文有法，果如是乎？”

(二)汪文：“使人主所以倚仗先生者，常如諫垣之時，則先生方納忠陳力之不暇，而何暇於歸！先生雖欲歸，太夫人亦不聽之歸也。今不幸回翔於閒署，名爲稍稍通顯，而實棄諸無所設施之地，則其從容陳乞於天子之前者，豈得已哉！”

葉評：“摘曰：吾聞君子之事其君也，無一官之不可居，無一職之不可盡。孔子爲委吏，爲乘田，爲司寇，官之尊卑大小不同，而盡乃心以盡厥職則同也。若鄙夫之持祿固寵則不然，但知從一身起見，則有官之尊卑大小，若者爲顯要，若者爲閒散，於是有幸不幸之見存於中，而患得患失之態形於外；若君子者，豈於此有幸不幸之心哉？使必以諫官居要爲幸，光祿丞閒散爲不幸，則虞廷九官，唯司空司徒納言之官爲幸，而典農教稼，若草木鳥獸之官，俱爲不幸；且十二牧之爲外吏，益不幸矣。夫京朝之官，如光祿丞比者，不可一二計，則不幸者甚多；朝廷亦何苦多設此不幸之官，以待天下不幸之賢才哉？爲此論者，亦乖於君子之心，人臣之道矣。”

且今之光祿丞，位亦清卿之貳也，所司者宴享飲食之事，此周官周禮之所研詳而有事者也；何處不可以節侈靡而抑浮費，盡心力以勤乃職乎；如下文所云財匱而民憊，光祿丞亦未始不可寓理財厚俗之一端，較之乘田委吏，其所設施也大矣！

即使魏先生隨處欲行其抗疏危言之志，何不於從容陳乞之時，引汲黯拾遺補過之言？使言之而允，則魏先生之幸；言之而不允，蹈不測之禍，則篇中言先生母子如鄒志完母子久矣，怡然安之若命，固其所也，又何有不得已哉？

搦管行文，胸無主宰，勉爲支撑，而不自知其言之矛盾也。

按汪琬之意，原爲就事論事，針對魏環極之降職，有所感發而作。葉燮之批評，却就普通事理說。就理論言，葉燮所說是對的；針對魏氏說，或者汪琬所說更合情理，至少在魏氏聽來較爲對勁。我們試一查魏環極的生平，知道他是一個耿直有才幹，‘不畏強禦’的人。先正事畧卷三魏敏果公事畧：

公性骨鯁，敢言事，尤注意於當世人才賢不肖，治術得失，民生休戚，是是而非非，必盡意乃止。

他的告養，在順治十六年（西元 1659）。歸養之前，議論時政，舉劾賣職的官吏，真是大膽的直言不諱。例如：

請聖躬慎起居一疏，辭逼輔臣。…疏上，人謂公禍且不測。有旨嘉之。又因災變陳言謂天地之變乃人事反常所致。歷舉近日顛倒旨意輕重綸言等事，語侵權貴尤亟。…公與諸大臣抗爭是非，在廷爲仄目。獨大學士范公文程心識之，曰：‘此我國家任事之臣也！’其後有構公者，輒於衆中剖晰之，卒得白。…十一年，大學士陳名夏得罪言官，坐不先事糾發，六科長皆被議，公降補詹事府主簿。…稍遷光祿寺丞。十六年告養歸。家居十三年，講求理學，以躬行實踐爲宗。丁母憂，喪葬悉準古禮。

康熙十一年（西元 1672）復起用，補御史。以後言政舉劾的事尤多。最重要的，乃因地震泣奏“索額圖明珠二相植黨市權，排忠良，引用僉壬，以剝蒸黎之應。”綜他一生，“彈劾必匪人，薦引必正人。”史家評爲直臣之冠。“嘗言：大臣之誼，在以人事君，故於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爭之尤力。”（以上據先正事畧。）

明白了魏環極之爲人及其出處，然後知汪琬送行之序，本來是對準了對象，對準了時代，說他的由衷之言。環極之在朝，抗論大計，時見施用；敢言敢行，卽王同所謂‘移孝爲忠’。而他見忌於人，幾蹈不測，他雖不愛惜他的生命，但對於當時的政治，對那一班營私戀棧的人不能不憤慨。他的乞歸終養，其用意正是用“以媿當世之嗜仕不止者。”不過汪琬措詞委婉，加一個‘若’字而不直說。汪琬所說，是有爲而發的。葉氏不明，只就普通立論，未免隔靴搔癢了。若照葉燮所論，對魏氏送行，反而勸他

留着不要走，是不但不明白當時環境，不明白被送者的心情，而且也沒有這樣的送行法，也沒有這樣的送行話。如果說汪氏的毛病在‘胸無主宰，勉為支撑。’那麼，葉氏的毛病是太有主宰，目無對方，不近人情。

最奇怪的是，葉氏本人，中進士後，做了一任寶應縣知縣，因為“出誣服殺人者，直仇陷附逆而冀沒其田廬者，以伉直不容於上官，不二年落職。”（註七）以後他就不再做官，徧遊海內名山大川。他以伉直不見容而落職，難道不了解魏氏的苦衷？只緣與汪琬爭勝，只顧抨擊，缺乏同情，當然不會深刻的了解作者的用意了。

又如金孝章墓誌銘一篇，作者用意，原在表彰一位前明遺民之性行學問。因為處在異族壓迫之下，言論不自由，所以隱約其辭，不敢明寫；只于字裡行間，婉轉敘述。章法頗亂，不像他文之有組織。葉燮謂為：“篇不成篇，句不成句，字不成字，段落不成段落。”對於喜言古文法的汪琬“爲之太息。”但我們讀了，轉覺作者苦心經營，既須避免觸犯文網，又須表達傳主的真面目，在這兩難中，真不易措詞。然而作者畢竟做到了；他瞞過了時人，瞞過了善于批評的葉燮，却叫二百年後的讀者，看出他的用意。這不能不說他技術的高超了。

我們看他如何寫金孝章：

1. 先引‘吾郡故多潔修好古獨行之君子’爲襯託；
2. 次就普通的‘希風慕義’的逸民遺老，引出‘初終一節’的真遺民金孝章先生；
3. 叙金孝章由任俠到隱遁之經過。他本來是一個有心人，對外族侵陵國家危亡而悲歌慷慨憤懣激烈的；但大局已去，無可挽回，只可‘高尙其事’不事異族，‘從此逝矣’！
4. 叙他好書畫，工詩古文詞。
5. 論他本非忘世之人，而生不逢時，不得已寄情于書畫，文中謂：“凡其邁往之性，磊落軒昂崢嶸突兀之氣，未及剗洗，方抑抑無所發舒，不得已寓之書畫

（註七）先正事略三十八葉橫山先生事略。

間。”這幾句是正寫，畢竟他是不能忘世的遺民，是常想有所動作，不甘臣服的遺民。接着說：“吳中後生晚進，高談賞鑑，徒知先生書畫之工，且竟欲求之筆墨蹊徑之外，俱未爲知先生者也。”這是反寫，所謂‘未知’，實是真知。但話說得太不順了，所以堯峯文鈔改爲“歎其書畫之工，且欲求諸筆墨蹊徑之內。”改外爲內，於文爲順，但他的本意，原是從反面說，要人“求真面目于筆墨蹊徑之外。”

接着又推進一層，謂：“以先生爲學遂古人超然自得者，仍未真知先生。”這也是反說，他本意是說，金先生是學古人而不做順民的，超然自得而不隨俗浮沉的。如果從學問上去了解金先生，那不是真知先生的。

6.“性好山水，作方外游。”本意是說不做滿清臣民。“遇方外士，常宿其廬”，即謂作方外之人，也即是‘不臣’之意。

“年踰七十，數乞知交賦生輓詩，引陶淵明自祭文爲喻。”這也是反說，並不是敘其“風流雅趣”，其意蓋以淵明爲比，淵明是不臣于宋的，金氏也不臣于清的。淵明自祭文有句說：“壽涉百齡，身慕肥遜。”這說的是隱居不仕。“奢耻宋臣，儉笑王孫。”這兩句最妙，表面上是用典，宋臣指桓魋，自爲石棺，三年而不成。孔子愀然曰：“若是其靡也！”（見家語）王孫指漢楊王孫贏葬。但也未嘗不可說，雖然可以富貴，但他却耻爲宋臣，他寧願克苦的做個遺民，做個亡國的王孫。

葉燮評：“此篇入手以大易樂天知命歸重先生，乃全篇終始無一字申樂天知命語意，總結以風流雅趣市井小說之談爲全文結穴，想其揚管時，是何肺肝！”實則風流雅趣乃反說，而引淵明自喻才是正意，淵明自祭文就是表現樂天知命的代表作。曰：“樂天安分，以至百年。”曰：“識運知命，疇能罔眷。”其他如“可以無恨，”“奚所復戀，”等都是樂天知命的話，全篇就是樂天知命的思想。葉燮不知從作者深意探求，只在字面上抨擊，一定爲作者所笑。

7. 末了記：“嘗有學使者，慕先生名，欲招致之，不可得；因歎曰：清高絕俗，雖古之沈冥不過也！”這就點出真意，說他不願做官，寧願做遺民，是‘清高絕俗，古之沈冥’的人物。這八個字不是寫遺民是寫甚麼？這篇墓誌，到此收結，以

下敘卒葬等事爲附錄。作者在這結束處明點金氏是明遺民作結，與篇首所敘潔修好古獨行之君子，遺榮弗仕，而隱于詩畫醫卜，以隱者自命的逸民遺老，可謂首尾照應，層次井然。

我們細玩汪琬此文，因爲有難說的苦衷，所以隱約其辭，或正敘，或反說，但他畢竟把一位遺民表彰了。葉氏如果看不出作者的真意來，被他騙了，這並不是作者的失敗，反而是成功。如果看到了仍然作表面上的抨擊，那就仍然是‘文人相輕’的意氣之見罷了。

總之，我們講文學批評，固不能不用分析歸納的方法，以求得一種客觀的標準，以爲衡量文學的尺度；但同時我們對於作品的研究，却不能不設身處地，同情作者；不同情則不能體會入微，不能有真切的了解。

當拜倫 (G. G. Byron) 還在大學讀書的時候，發表了一本詩集，叫做無聊的時候，(Hours of Idleness)，詩是幼稚的，被當時的文壇權威愛丁堡評論嚴刻的批評，說那是只知依韻寫作的東西，十個受過教育的人，九個都能寫，第十個還要寫得更好。那就是說他的作品毫無價值。這可把這位青年氣壞了，他像一隻受傷的獅子一樣暴怒，他反抗，寫了一首諷刺詩叫做英國詩人與蘇格蘭評論家，把當時的批評家與所有的文人都罵盡了。這樣的對罵，都是不對的，愛丁堡評論苛刻的挖苦，拜倫瘋狂的反抗，都不是評論的正軌。

批評須客觀，而同時又須同情。

四、推敲與同情

從作家的整個作風言，如果有相異的風格，我們應該與以同情的了解，認識對方的長處，然後可以有公平的批判；就一篇文章說，也需要寄以同情，然後有親切的了解。我們還可以說，即使一字一詞一句的推敲修改或指摘，也得有這種同情了解的需要，而不單是字面形式上文法學或修辭學的問題。

我們先舉‘推敲’一例來說吧。唐遺史載：

賈島初赴舉在京，一日，在驢上得句云：‘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引手作

推敲之勢.時韓退之爲京兆尹，車騎方出，島不覺行至第三節。左右擁至尹前，島具告所得詩句。退之遂並轡歸，爲布衣交。(野客叢談卷六賈島條)。

在這裡，‘敲’字何以比‘推’字好，單從字面上說，我們是分辨不出的。近人朱光潛先生就有反對古人的說法，從另一方面去解釋。他說：

一般人根本不瞭解文字和思想情感的密切關係，以爲更改一兩個字，不過是要文字順暢些或是漂亮些。其實更動了文字，就同時更動了思想情感；內容和形式是相隨而變的。姑舉一個人人皆知的實例。韓愈在月夜裡聽見賈島吟詩，有‘鳥宿池邊樹，僧推月下門，’兩句，勸他把‘推’字改成‘敲’字。這段文字因緣，古今傳爲美談，於(是)今人要把咬文嚼字的意思說得好聽一點，都說‘推敲’。古今也都讚賞‘敲’字比‘推’字下得好。其實這不僅是文字上的分別，同時也是意境上的分別。‘推’固然顯得魯莽一點，但是它表示孤僧步月歸寺，門原來是他自己掩的，於今他‘推’。他須自掩自推，足見寺裡只有他孤零零的一個和尚。在這冷寂的場合，他有興致出來步月，興盡而返，獨往獨來，自在無碍，他也自有一副胸襟氣度。‘敲’就顯得他拘禮些，也就顯得寺裡有人應門。他彷彿是乘月夜訪友，他自己不甘寂寞，那寺裡假如不是熱鬧場合，至少也有一些溫暖的人情。比較起來，‘敲’的空氣沒有‘推’的那麼冷寂，就上句‘鳥宿池邊樹’看來，‘推’似乎比‘敲’要調和些。‘推’可以無聲，‘敲’就不免剝啄有聲，驚起了宿鳥，打破了岑寂，也似乎頻添了攬擾。所以我很懷疑韓愈的修改是否真如古今所稱賞的那麼妥當。究竟那一種意境是賈島當時在心裡玩索而要表現的，只有他自己知道。如果他想到‘推’而下‘敲’字，或者想到‘敲’而下‘推’字，我認爲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問題不在‘推’字和‘敲’字那一個比較恰當，而在那一種境界是他當時所要說的而且與全詩調和的。在文字上推敲，骨子裡實在是在思想情感上‘推敲’。(談文學：咬文嚼字)

朱先生的話，很可以做我上面所說“同情的了解”的一種說明，我們要透過了文字從思想情感上，從作者意境上，去了解文學。可惜朱先生所舉的這個例給說錯了，這裡要提出來討論討論。

第一，這個故事，朱先生似乎只憑記憶，沒有說出他的根據來。據上面所引唐遺史，說賈島于驢上得句，練之未定，不覺衝尹。（註八）並非韓愈在月夜聽見賈島吟詩。朱先生似乎因‘僧推月下門’這一句聯想到月夜吟詩，所以以下的推敲，又由這月夜一直推敲下去。不知朱先生何所根據？

第二，這個月下推門或敲門的和尚，並非步月歸寺，這門並非他自己掩的；却正是“月夜訪友。”朱先生要我們注意他當時所說的境界，與全詩調和的境界，我們把全詩錄出來看：

題李凝幽居

閑居少憐並。草徑入荒園。

鳥宿池邊（一作中）樹，僧敲月下門。

過橋分野色；移石動雲根。

暫去還來此，幽期不負言。（唐賈浪仙長江集卷四，四部叢刊本）

李凝，弋陽人，父營，子楚，三代以孝友聞，名見新唐書 195，孝友傳，事蹟不傳，但名列孝友，島題他的幽居，一定是一位隱君子。詳此詩所言，這個僧，是賈島自己。賈島是先做和尚，後還俗應試的。新唐書島傳：

初爲浮屠，名无本，來東都時，洛陽令禁僧午後不得出。島爲詩自傷，愈憐之，因教其爲文，遂去浮屠，舉進士。

（註八）新唐書 176 賈島傳：“當其苦吟，雖逢值公卿貴人，皆不之覺也。一日，見京兆尹，跨驢不避，詰之，久乃得釋。”此處不記京兆尹爲韓愈，所載亦稍異。

野客叢談又引摭言：“賈島太和中，嘗跨驢張蓋，橫截天衢，時秋風正厲，黃葉可掃，島吟曰：‘落葉滿長安’，求一聯不可得，不知身之所從，因衝京兆尹劉栖楚節，被繫一夕，釋之。”傳聞異辭，似又一事。

又歸海‘推敲’條引隋唐嘉話載賈島遇韓愈事，查顧氏文房小說內唐劉鈞隋唐嘉話三卷，無賈島事，不知歸海何所本。

他與韓愈相識，似在他四十七歲時。（註九）他這一次是月夜來訪李凝的。還于臨走的時候，說過不久必再來。賈島最喜歡月夜的，詩集中不少寫月的詩。月夜訪友，幾乎是他的習慣，詩集中有一首過唐校書書齋，與題李凝幽居相類：

池滿風吹竹， 時時得爽神。

聲齊雛鳥語， 畫卷老僧真。

月出行幾步， 花開到四鄰。

江湖心自切， 未可掛頭巾。

此外有翫月，宿懸泉驛，絕句，酬栖上人，上谷送客遊江湖，投孟郊，就峯公宿，寄山中王叡，送崔定，寄白閣默公，寄無可上人，南池，昇道精舍南台對月寄姚合，等，說到月的，真是數不勝數。他是特別喜歡月。他這一首題李凝幽居，是他訪李凝無疑，僧就是他自己。在月夜之下，景色特別美。他訪友，如果是推門，那就表示他是常來之客，不請自進。而月下敲門，舉動則較閒雅，最合月下的時間性與做僧人的身分。不然，半夜裏一個和尚闖進人家裏去，真是小說裏所說的，非姦即盜了。詩裏的“草徑入荒園”，是寫幽居；“鳥宿池邊樹，”“過橋分野色，移石動雲根，”是月下所見的景色。他要畫一幅月夜訪友圖，把自己也放在畫圖中了。

總之，這是作者寫他月夜訪友，他的意境，我們可以玩索而得的。並不是荒山野寺的月夜歸僧推他自己的門。所以朱先生的推敲，完全是就那兩句詩而想像的；並不是就全首詩去了解作者。如果就全詩說，自然韓愈選擇‘敲’字，較比‘推’字好了。古今讀者，並沒有盲從。

朱先生這一個例說錯了，但他舉的另一個例是好的，我們沒有讀朱先生的文章之先，本來也就那樣看的。這裏就引朱先生的話做說明。

史記記李廣射虎一段：

‘李廣見草中石，以爲虎而射之，中石沒鏃；視之，石也。因更復射，終不能入石’

（註九）關於這事的考証，可參看陸侃如馮沅君中國詩史中冊第四篇杜甫時代，807—808頁。

又：據野客叢談所引，新唐書，唐遺史及摭言三種記載，是大有出入的，王欽根據島集中詩，定遺史所言較可信。

矣。'這本是一段好文章，王若虛在史記辨惑裡說它‘凡多三石字，’當改爲：
 ‘以爲虎而射之，沒鏃；既知其爲石，因更復射，終不能入。’或改爲：
 ‘嘗見草中有虎，射之，沒鏃，視之，石也。’

在表面上改的似乎簡潔些，却實在遠不如原文。見‘草中石，以爲虎，’並非‘見草中有虎。’原文‘視之，石也，’有發見錯誤而驚訝的意味。改爲‘既知其爲石，便失去這意味。原文‘終不能復入石矣，’有失望而放棄得很斬截的意味，改爲‘終不能入，’便覺索然無味。

王若虛是金代的一位學者，生於金世宗大定十四年，卒於金亡後十年，（西元1174—1243）所著文章號慵夫集若干卷，現存滹南遺老集四十五卷續附一卷。滹南遺老集中前四十卷都是批評的文字，自五經諸史到詩文，都有所‘辨惑’。他的文學主張，重典實不重華麗，重平易不重奇險，重繁簡得當，不重修辭增飾，重自然不重模倣。他的精神在一字不苟，力求妥貼。他的毛病，在于過份吹求，只知在文字形式上去咬嚼。上舉一例，就可見到。他在這一節的批評，是以簡潔爲主，主簡不主繁，本是古文家最普通的見解。不過文章不能以簡潔爲絕大標準的，清儒顧炎武說：“辭主乎達，不論其繁與簡也；繁簡之論興，而文亡矣。”（日知錄卷十九。）王若虛拿簡潔的標準來刪改史記，不知史記的文字，不只達意，而且傳神。被他這樣一改，把描狀活躍的文章，改成死板板沒生氣的文章了。

關於以簡爲標準而評文的，還可以再舉一例爲參考。滹南遺老集卷十五：

“司馬相如病甚，天子曰：‘可往從悉取其書！’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無書。問其妻，對曰：‘長卿固未嘗有書也。’——時時著書，人又取去，即空居。——長卿未死時，爲一卷書，曰‘有使者來求書，奏之。’無他書。”其遺札言封禪事，奏所忠，所忠奏其書，天子異之，其書曰：……”凡用十‘書’字，何其繁也！若云：

“相如已死，其妻曰：‘長卿固未嘗有書，時有所著，人又取去，且死，獨遺一卷，’曰：‘有使者來即奏之’其書乃言封禪事也，既奏，天子異焉。”
 其辭云云，不亦可乎？

此段在漢書改爲“所忠奏焉，天子異之。其辭曰：……”刪了一句及一‘書’字，改一‘書’字爲‘辭’字。蓋班固已覺其繁複，故有所省改。漢書共刪改了三個書字。王氏想由十‘書’字省改留下三個，以爲這是省無可省，改無可改的了。這是一種避免重複的簡潔法，在必要的時候，似乎也須注意的。不過在史記相如傳這樣的連用十個‘書’字，如果不是有意的重複，我想就是拙劣的作家也不會不注意到吧。按修辭學上有所謂“複疊法”，例如：

- (1) 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論語：爲政）
- (2) 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書：大禹謨）
- (3) 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之利也。……利而後利之，不如利而不利者之利也。（荀子：富國篇）
- (4) 爲可爲于可爲之時，則從；爲不可爲于不可爲之時，則凶。（楊雄：解嘲）（註一〇）
- (5) 春江潮水連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灔灔隨波千萬里，何處春江無月明。江流宛轉遶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空裏流霜不覺飛，汀上白沙看不見。江天一色無纖塵，皎皎空中孤月輪。江畔何人初見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無窮已，江月年年祇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見長江送流水。……昨夜閑潭等落花，可憐春半不還家。江水流春去欲盡，江潭落月復西斜；斜月沉沉藏海霧，碣石瀟湘無限路。不知乘月幾人歸，落月搖情滿江樹。（張若虛：春江花月夜）
- (6) 春將暮，花漸無，春催得落花無數。春歸時寂寞景物疎，武陵人恨春歸去。（馬致遠：落梅花。）
- (7) 齋臻臻珠圍翠繞，冷清清綠暗紅疏。但合眼夢裡尋春去：春光堪畫，春景堪圖；春心狂蕩，春夢何如？消春愁不曾兩葉眉舒，嚮春嬌一點心酥。感春情來來往往蜂蝶，動春意哀哀怨怨杜宇，亂春心嬌嬌怯怯鶯鶯。春光怎如！綠窓猶唱

（註一〇）這一條，王若虛亦有批評，以爲不成義理，見遺老集卷三十四，其實這也是一種複疊法。

留春住。怎肯把春負。長要春風醉後扶，春夢似華胥。（馬致遠：惜春曲。）

我們要着重某一點，就會故意把它重複的說，令聽者注意，好像紅樓夢第一回跛足道人唱好了歌，“土隱聽了，便迎上來道：‘你滿口說些甚麼？只聽見些‘好了’，‘好了’。’那道人笑道：‘你若果聽見‘好了’二字，還算你明白！可知世上萬般‘好’便是‘了’；‘了’便是‘好’；若不‘了’，便不‘好’；若要‘好’須是‘了’！我這歌兒便叫好了歌。’

史記相如傳這一段‘取書’的話，我以為又是太史公傳神之筆。你看他：皇帝鄭重其事的，老遠的派個特使去，要把他的‘書’，統統都拿來。在臨行的當兒，天子還特別囑咐一聲“若後之矣！”（這一句是漢書添補上的，必有所本。意思是說，“你得趕快去！遲了，便趕不上了！”）這位特使，所忠先生，還不快馬加鞭的趕去嗎。誰知趕到了，相如早已死了。這位使者氣喘吁吁地趕着相如的未亡人叫：“趕快把相如的書統統都拿出來！趕快的拿出來！”把這位相如夫人，鬧得像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那位使者一邊只管催。

“長卿這個死鬼沒有甚麼書呵！”她只可這樣頂回一句。

“甚麼！相如是大文豪，常常著書，爲甚麼說沒有書？”

“不錯，他是常常寫點甚麼書的；不過，寫了便被人家搶去了。你瞧！現在還是這樣住着只有四面牆的空房子，甚麼都沒有！更沒有那些沒用的書！”

“真是沒有！”這位使者繃着一副青臉兇兇地說。

“有是有一卷書，是長卿還沒死的時候寫的，說：等天子有使者來求書的時候，才獻上去。切勿輕易拿給人瞧！”

“快！快！快把書拿出來！”

她跑到床上在枕頭底下把那本用破布包着的一本書掏出來，雙膝跪下顫危危地，雙手奉獻給那位使者，（註一一）說：

（註一一）漢書把‘無他書’及‘奏所忠’兩句刪去，就是對於史記描寫當時的情形語氣未能完全了解的緣故。

“就只有這一本了；其他便沒有甚麼書了！”

使者便把那一札遺書捧着走了。

我想就是這樣一幕‘取書記。’太史公把當日的情景描寫出來，我覺得它生動極了！我們讀了，並不討厭他多用‘書’字；反而覺得惟其這樣多用‘書’字，才把當日的神情活靈活現地傳達出來。一幅名畫，如它本來就以着色濃厚來刺激我們，顯示它的特性的，而我們看不慣，以為淡墨素描的畫最好，給它劣評，甚至要把那幅名畫的彩繪都刮剝了去，這豈不是太沒道理嗎！

要了解與欣賞文藝作品，說易也難，說難也易。古今來不知有多少聰明的作家，為偏見所限，互相攻擊。愈攻擊愈流于偏見，對於異己的文藝，愈不能了解。我們要做一個文藝欣賞者，做一個文藝研究者，做一個文藝批評家，最要緊的，要做一個認真的讀者，要有同情的態度，要設身處地的去想像，要神遊默契的體會，這樣，我們可以有深刻的了解，親切的欣賞，與公平的批評了。

民國三十七年四月二十八日嶺南大學思學軒。

(補記)文成後，讀章實齋文史通義，其文德一篇，論臨文必敬，論古必恕，所謂‘論古必恕，’正是我們所謂同情的批評，他的話很可以做本文的印證。章氏識解超卓，不特于史學有特見，于文學亦具卓識，因錄其文以資參證。

“凡為古文辭者，必敬以恕：臨文必敬，非修德之謂也；論古必恕，非寬容之謂也。敬非修德之謂者，氣攝而不縱，縱必不能中節也。恕非寬容之謂者，能為古人設身而處地也。嗟乎！知德者鮮：知臨文之不可無敬恕，則知文德矣。……”

“是則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論古人文辭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處，亦不可以遽論其文也。身之所處，固有榮辱隱顯屈伸憂樂之不齊，而言之有所為而言者，雖有子不知夫子之所謂，况生千古以後乎。……”